

# 十三經 講座

夏傳才 著

## 前言

十三經是中國古代影響最大的十三部儒家基本經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作為中國人的傳統讀本，它們曾經是歷代學者長期研究的對象，也為全世界的華人和各國漢學家所研讀。它們卷帙浩繁，語言古奧艱深，涉及許多學科，當代讀者很難通讀。對它們的主要內容，用現代的觀點，以通俗暢曉的語言，簡明扼要地作科學的、概括的、系統的介紹和評述，對弘揚民族文化，批判地繼承優秀文化遺產，以及促進中外文化交流，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20世紀初葉的幾位國學大師，曾有《群經概論》之類的著述，內容簡略繁冗不等，觀點頗為陳舊，不能納入現代文化的範疇。40年代初，蔣伯潛先生著《十三經概論》，迄今仍為海內外通行的讀本。但其內容和表達形式，早已不適合半個世紀後的當代的需要。此後，朱自清先生著《經常常談》，范文瀾先生著《經學講演錄》、《中國經學史的演變》，周予同先生著《經學史論著選集》，把經學研究提高到新水平。80年代，北京中華書局《文史知識》雜誌連續發表《經書淺談》，均由名家執筆。這在新時期帶了個好頭，其開創之功不可磨滅，惜過於簡略。半個世紀以來，包括經學在內的整個學術領域有很大進展，地下資料也有新發現，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初步總結過去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吸取現代學術研究和地下發掘的新成果，對十三經逐一進行概說和評述。人類的認識能力總是不斷地由淺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低級向高級發展，永無止境，後來者居上。完成一部烙下我們時代印記的新的講述十三經的著作，是歷史給予當代學人的任務。

由於工作需要，80年代筆者為研究生開設了這門課，目的是扼要地、評述性地介紹這十三部經典的主要內容。其間也應邀在九所大學講述了本課的全部或部分內容。這些知識對學生有吸引力，加上當時的「傳統文化熱」，所以課程很受歡迎。本書就是在教學的過程中，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並不斷吸收新的資料，邊講邊改，經初稿、再稿到初步成書，又用一年多的時間進行了修改、充實和提高。這本書成為現在的樣子，用了整整七年時間。

研究十三經的古籍浩若煙海，任何一位學人，終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把所有經學著述讀完，現當代的論著又何止萬千？筆者限於條件，必然孤陋寡聞；兼之十三經所涉及學科門類相當廣泛，評述實難處處中肯；從古到今，每一經都有難解的問題、聚訟的懸案，更非個人所可斷定。好在本書的任務在於評述介紹各經主要內容，對前賢和現當代名家的許多卓見，筆者旨在綜合—分析—綜合，求同存異，或斟酌取捨，然而其訛誤不當之處，亦當難免。筆者年屆七旬，精力衰退，年齡已不允許我再鑽研幾年，只有將書稿問世，拋磚引玉，寄希望於後來者，並期待專家和讀者的教正了。

夏傳才

1997年8月29日

# 目錄

## 第一講 經和經學

- 第一節 甚麼是「經」…………… 2
- 第二節 孔子與六經…………… 5
- 第三節 從六經到十三經…………… 8
- 第四節 經學研究的對象和範圍…………… 20
- 第五節 經學主要流派的發展——漢學系各派…………… 32
- 第六節 經學主要流派的發展——宋學系各派…………… 45
- 第七節 經學主要流派的發展——新漢學系各派…………… 54

## 第二講 《周易》

- 第一節 《易經》…………… 65
- 第二節 《易傳》…………… 88
- 第三節 《周易》的解說和研究…………… 99

## 第三講 《尚書》

- 第一節 《尚書》的時代和體例…………… 108
- 第二節 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 111
- 第三節 《虞書》和《夏書》…………… 120
- 第四節 《商書》…………… 131
- 第五節 《周書》…………… 137
- 第六節 《尚書》的訓詁、版本和義理研究…………… 152

#### **第四講 《詩經》**

第一節	詩三百篇產生的時代和地域	162
第二節	三百篇的採集、應用和編訂	167
第三節	六義	174
第四節	三家《詩》、《毛詩》和《毛詩序》	178
第五節	《頌》——西周的頌歌	188
第六節	《雅》——貴族的詩篇	192
第七節	《國風》——民間的歌辭	198
第八節	《詩經》的語言藝術	212
第九節	《詩經》的注疏和研究	217

#### **第五講 三《禮》**

第一節	《周禮》	222
第二節	《儀禮》	238
第三節	《禮記》	250

#### **第六講 《春秋》三傳**

第一節	《春秋》經	276
第二節	《左傳》	283
第三節	《公羊傳》	296
第四節	《穀梁傳》	304

#### **第七講 《論語》**

第一節	孔子和孔門弟子	310
第二節	今、古文《論語》和注本	320

第三節	《論語》論仁	325
第四節	《論語》論禮	333
第五節	《論語》論中庸	339
第六節	《論語》論政治	343
第七節	《論語》論教育	352
第八節	孔子研究應注意的問題	358

## **第八講** 《孝經》

第一節	作者和寫作時代及版本	362
第二節	十八章內容大要	364
第三節	《孝經》的批判	373

## **第九講** 《爾雅》

第一節	作者、成書時代和篇數	379
第二節	《爾雅》的分類和內容	381
第三節	《爾雅》的體例和訓詁方法	406
第四節	《爾雅》的價值和使用	409
第五節	《爾雅》的注疏和「群雅」	413

## **第十講** 《孟子》

第一節	孟子其人其書	420
第二節	孟子的政治思想	426
第三節	孟子的哲學思想	439
第四節	孟子的教育思想	454
第五節	孟子的文藝思想	461
第六節	《孟子》的注疏和研究	470

第一講

經和經學

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以儒學為主體，儒學以經學為根本。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清理中國文化發展的歷程，不能不了解經學的內容。

了解經學的內容，不能不首先了解甚麼是「經」，甚麼是「經學」。

## 第一節 甚麼是「經」

甚麼是「經」？從古到今，許多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考釋，曾經形成「經名考」這一專門學問，給「經」字所下定義不下二三十個。眾說紛紜，讓人眼花繚亂，以致現代一位著名的學者歎息說：「甚麼叫『經』，恐怕誰也講不通。……為甚麼叫『經』，是無法說清楚的。」<sup>①</sup>其實，把古今的考釋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是可以大體上講通、說清的。

「經」的初字是「罍」，始見於周代銅器，孟鼎、克鼎、毛公鼎、克鐘上面都有「罍」字。「罍」即「絲」。古文字學家認為「罍」就是「線」。古代的典籍寫在二尺四寸長（漢制尺約今二十厘米）的竹簡或木牘上，用絲繩串起來。這個尺寸的簡牘，在當時是最大號的，相當於現代最大的版本，表示用它書寫的典籍很重要；這些典籍就叫「經」。解釋這些「經」的意義的文字，寫在較小簡牘上，大約八寸或六寸長（漢制一寸約今二厘米），就稱為「傳」，以示與前者的區別。「經」也就是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的「韋編」，只是用皮條代替絲繩或麻繩罷了。現代在考古發掘中出土的竹簡、木牘，都有用絲繩、麻繩、皮條編綴成

---

① 范文瀾：《經學講演錄》，《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



冊的痕跡。對於這個問題，章太炎曾這樣說：「經者，編絲連綴之稱，猶印度梵語之稱『修多羅』也。」<sup>①</sup>印度的「修多羅」也是以絲編貝葉為書，漢譯也譯為「經」。所以，「經」原意是指重要的書籍。

從「經」這個字本來的意義上說，這個名稱，並不是某一學派的專用名詞。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典籍也往往稱「經」。在現有文獻中，最早用「經」名的是《墨子》，有《墨經》上、下篇。《莊子·天下篇》開始稱儒家的六種典籍為「六經」，可見那時儒家學派已稱這些典籍為「經」了。戰國後期的《荀子》一書裡引述《道經》(今不存)的文字。《國語·吳語》的「挾經秉枹」，稱兵書為「經」。《內經》、《難經》則稱醫書為「經」。可見，各個學派都可以稱謂自己學派的重要典籍為「經」。

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政策，確立儒家思想為一尊。為了樹立儒家思想的權威地位，一方面由政府立五經博士(國家任命的教授)廣泛傳授儒家經典，一方面製造各種說詞，把儒家經典神聖化。於是，「經」的詞義被無限引申。如：

班固《白虎通》釋「經」為「常」：「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這是說，「經」是社會倫理道德的準則。

許慎《說文解字》釋「經」為「織」。段玉裁注：「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進一步把「經」說成貫穿天地和人世間一切事物最根本的理絡。

劉熙《釋名·釋典藝》又說：「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這是指「經」的內容無所不包，無所不能，是處理事情的門徑。

① 章炳麟：《國學概論》。

《孝經序疏》引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鄭玄《孝經注》：「經者，不易之稱。」南朝梁代劉勰把這個意思作了更明確的概括：「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sup>①</sup>指出「經」是必須遵循的萬世不可改變的法則。

從漢儒到清儒，這類解釋還有很多。這些紛繁眾多的義項，基本意思只有一個：「經」是萬世不變的永恆真理，它放之四海而皆準，天地間無往而不通。

這樣的一些引申，距離「經」名的本義，已經很遠了。

從漢代開始，儒家幾部古老的典籍，被封建政府頒定為法定教科書，唐代又欽定為「明經」科舉士的考試內容，到明、清兩代，仍是科舉考試的依據。這樣，「經」又成為封建國家法定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用書的代稱。

西漢儒家曾經把讖緯神學和陰陽五行學說與五經結合，從而把「經」的內容和名稱宗教化、神秘化，再和偶像化的孔子聯繫在一起，它又變成宗教性的「聖經」。以後，其他學派也各立自己的「經」，如道教稱《老子》為《道德經》，稱《莊子》為《南華經》，稱《列子》為《沖虛至德真經》；佛教、伊斯蘭教宣揚教義的典籍，分別譯稱《佛經》、《可蘭經》。「經」這個名稱又指某一教派宣揚教義的用書。中國封建末世的頑固保守派，曾經倡議創立孔教，奉孔子為教主，奉五經為孔教的經書，也同樣是把儒家經書作為新的宗教聖經。

我們現在談的「經」，是恢復它的本來面目，指的是古代儒家的幾部重要書籍。我們承認它們在長期封建社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並不認為它們有絲毫的神聖性，而只是把它們看作是一些有研究價值

① 劉勰：《文心雕龍·宗經》。

的古老的文獻，而努力恢復它們本來的面目。

## 第二節 孔子與六經

我們現在講的十三經，是經過歷代擴充，到宋代才完成的。在戰國時代，儒家學派傳授六經，而傳到漢代的是五經。以後所說的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或四書五經，都是從五經擴充的。五經是十三經的核心和基礎，是儒家最基本的經典。

孔子和六經的關係是甚麼？這是中國文化史上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

在先秦文獻裡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記述。《莊子·天運》記述孔子問禮於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論語》多次談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授弟子。《孟子》的《滕文公下》、《離婁下》都說孔子依據魯史作《春秋》。《荀子·儒效》稱孔子為聖人，稱堯、舜、文、武、周公為聖王，說五經記述了聖王和聖人的「志、事、行、和、微」。綜合先秦這些資料，可以這樣認為：孔子搜集、整理古代文獻，整理出六種讀本傳授學生。這個說法，大體上歷代是公認的。

司馬遷著《史記》，他調查孔子的事跡，綜合當時留存的材料，在《孔子世家》中作了比較系統的敘述。他說，在孔子時代，「禮、樂廢，《詩》、《書》缺」，孔子搜集三代文獻，編次《書》並序《書傳》，刪訂《詩》「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修正《禮》、《樂》，作《易》的《彖

辭》、《象辭》、《繫辭》、《文言》、《說卦》等部分，又據魯史作《春秋》。司馬遷的記述，反映今文學的觀點。古文學提出五經都是西周舊典，但不否認孔子曾經進行刪訂並作過序傳，他們甚至偽託孔子的名義偽造一些書。宋學雖然對司馬遷的記述提出過一些懷疑和異議，但主要是論證孔子整理過哪一部分或未整理過哪一部分，作過哪些序傳或未作過哪些序傳，以及對偽書進行辨偽，但總體上仍然肯定孔子的著述權。清代所進行的論爭，基本上沒有越出這個範圍。經過他們的考辨，使人們對問題加深了解。大體上說，清古文學者認為孔子主要是整理這些古代文獻，論證許多託名孔子的序傳並不是孔子著的；清今文學者則堅持六經是孔子的著述。

綜合前人的論證和考辨，我們可以得出以下認識：

首先，六經本來是古老的文獻，《易》是古代占筮用書，《書》是三代歷史檔案文獻，《詩》是周代詩歌總集，《禮》（指《儀禮》）是殘缺不全的周、魯各國禮儀的記錄，《樂》早已亡佚不論，《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由於周室衰微和舊貴族沒落，大批文獻散失或殘缺。孔子歷來愛好和重視古代文獻，進行了大量的搜集。他晚年創辦私學，因為教學需要，分別進行不同程度的整理，整理出六種讀本傳授給學生。後來他的弟子形成戰國時期最大的儒家學派，將這六種讀本代代相傳，便成為儒家的基本經典。由此可見，正是由於孔子的搜集整理和傳授，這些古老而珍貴的文獻才不致於湮沒；也正是由於孔子在封建社會顯赫的地位及其在思想界崇高的聲望，這些文獻才歷經漫長的歲月和無數次社會的動亂，仍得以保存和流傳。

其次，孔子整理每部經書的具體情節，例如，古時古詩和三代文獻，孔子見到的究竟有多少，他如何整理和刪訂等等，古人沒有留下

材料，我們無法考證。但是，我們從確實可信的《論語》中，通過孔子自己的說明，還是可以大體上了解孔子整理六經的基本情況。孔子自述他整理古文獻的原則和方法有四點：

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他說他相信和愛好古代文獻，他只是傳述它們，而不增添和創作新內容。由此可以相信，經他選錄的這些文獻，能夠基本上保持原來的內容和表達風格，具有歷史的真實性，從而為後世保存了比較可靠的史料。

二、「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他排斥妄誕、苛政、暴力和神鬼迷信等內容，這些內容在五經中確實沒有選錄。

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為政》)：他所說的「異端」，指的是與他的學說絕不可相容的對立的學說。他認為讓學生接觸異端學說，會產生極大的弊害，必須予以排斥，因而在五經中也無一選錄。

四、「《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他對原始文獻和各國土風的整理，都採用雅言，即當時通行的標準語，因而必然要進行文字和語法的改動和加工，取得語言上的統一。

從上述四條原則和方法來看，孔子的「述而不作」，實際上是以述代作，既保存原來的內容和文辭，又反映孔子的哲學觀點和政治觀點，並且實現了內容的精煉和在當時條件下的語言規範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六經又可說是孔子的著述。

再次，我們現在看到的五經，已經不是當年孔子整理刪訂的原貌。這一方面是因為在五經流傳過程中內容不斷豐富，有後人增添的內容，如《易》的經文有戰國人補充的；《儀禮》第 17 篇是後加的；《書》今文 28 篇中的一部分寫定於戰國。在另一方面，古代文獻傳授多為口耳相傳，或手書於簡牘，很難準確統一。尤其經過秦代焚書，漢初各經各家傳本的編次和文字都有所不同，很難確定哪家傳本最接近孔

子手定的原本。至於後來又擴充為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所擴充的經書，多是後儒的著述了。不過我們現在看到的五經，雖然已經不是孔子的原本，但是仍以孔子的原本為核心和基礎，它們仍與孔子有密切的關係。

### 第三節 從六經到十三經

通行的儒經有十三種，即所謂十三經。它是六經經過一千餘年的不斷擴充，發展到宋代而完成的。其間，經學的內容也得到了不斷豐富和發展。

先秦時期的六經，傳到西漢只有五經，東漢時期有七經之名，唐代先後擴充為九經、十二經，宋代再增至十三經，以宋版《十三經注疏》為本。現在通行的是清代阮元的校刻本。

#### 六經的次第

在先秦文獻裡稱述六經之名，始見於《莊子》的《天運》、《天下》、《徐無鬼》諸篇。西漢又稱六經為「六藝」，如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六藝」，也就是六種教學科目的意思。儒家學派確曾把它們作為教學科目。

六經的次第如何排列，從漢代起，一直有不同意見。這個情況，反映了對待六經的不同的指導思想，表現了對諸經內容和產生時代的不同解釋。

從先秦到西漢今文經學派，一般都這樣排列六經的次第：《詩》、《書》、《禮》、《樂》、《易》、《春秋》。所以這樣排列，是根據這六種教學科目的深淺程度和課程安排的先後順序。《詩》列於首，始自孔子。孔子多次談教學教材，《論語·泰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述而》：「《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禮記·經解》引述孔子的話：「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這裡的《禮》、《樂》次序偶亂，但還是《詩》、《書》為首。孔子認為《詩》有「興、觀、群、怨」的功能，同時還是常識課本；《論語·陽貨》：「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經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也是語言課本，《論語·季氏》：「不學《詩》，無以言。」因此，孔子把《詩》作為入門教科書。《書》是歷代政府檔案文獻，孔子想讓他的學生將來從政，所以要學《書》增長政治知識。《詩》、《書》是孔門教學的基礎課，所以列在先。《禮》、《樂》是實踐課，所以列在其次。《易》、《春秋》文字艱深，含義幽微，今文學家認為《易》窮天地陰陽之變化，《春秋》蘊含孔子的「微言大義」，二者發揮孔子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屬於高級教育，所以列為最後的教學科目。

古文經學派的六經次第則是：《易》、《書》、《詩》、《禮》、《樂》、《春秋》。他們這樣排列，是依照他們所理解的六經產生時代的早晚次序。班固的《漢書》和《白虎通》，范曄的《後漢書》，採古文經學的觀點，都這樣排列。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說得很明白：「五經六籍，聖人設教……今欲以著述早晚，經義總別，以成次第」，「《周易》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為七經之首。《古文尚

書》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毛詩》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宜次文王。《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古文學家在這裡論斷諸經產生的時代，是很不準確的。經後人考證：所謂伏羲畫八卦，是無根據的傳說，《易》是占筮用的書，由兩種最簡單的基本符號構成卦畫，和後來抽籤算卦指標某籤某卦的號碼一樣，只是標識性的符號，本身並沒有甚麼意義；《古文尚書》實際上是後人的偽作，保存在《今文尚書》中的《堯典》，也不是唐堯時代遺留的文獻，而是周代史官據遺聞傳說所編寫；《毛詩》中的《商頌》並不是殷商時代原來的頌詩，而是春秋時期宋國的祭祀樂歌，它寫定的時代較其他詩篇不是早，而是晚；《周禮》實際不是完成於西周，而是經由戰國以迄東漢儒家陸續編纂和增補而成。近世這方面的考證，大多具有不可辯駁的說服力，證明古文經學六經次第所據的寫作時代不可憑信。

在整個封建文化史上，今文學派、古文學派、宋學派及清代的新漢學派，關於六經產生的時代，曾長期進行熱烈的爭辯。這些爭論，基本上是今文學派與古文學派兩種不同觀點的論爭，反映了對六經根本性質的兩種不同認識。一派主張六經是孔子刪定的不同課程的教科書，六經次第按內容深淺、課程先後排列；一派認為六經是古代史料，六經次第應按史料的時代先後來排列。有的人認為六經是孔子垂教天下的萬世準則，其中包含着深奧的「微言大義」，所以不可改易和違背；有的人認為「六經皆史」，孔子只是整理過其中的史料而已。關於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對各經又各有不同的意見，茲不贅述。

我們認為今文經學的六經次第，比較符合先秦時期儒家學派使用這六種典籍的實際情況，但並不同意今文學派所說的它的內容是甚麼



「萬世準則」，或其中有所謂聖人的「微言大義」。古文經學派按六經的時代先後安排次第，雖也不失為一種可取的方法，但它對諸經時代的論斷是錯誤的。宋版《十三經注疏》中的諸經次第，基本承襲古文學派的觀點，現在大家仍然採用。本書也採用這個次第，因為這個注疏本已通行將近千年，我們只是沿襲習慣說法，而不是同意它所說的諸經產生的時代。

## 六經存五經

先秦時代的六經，傳下來的只有五經。西漢初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裡還是六經經名並稱，文帝、武帝時期立五經博士，無《樂》博士，說明官學傳授已無《樂》科。司馬遷作《史記·儒林傳》，也不見《樂》經之名。可見在西漢前期，《樂》已經失傳，六經只存五經。

關於《樂》亡佚的問題，自來有兩派意見：

一派認為，先秦的六種經書，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都受到很大的摧殘，依靠在民間口耳相傳而艱難地保存。漢初開書禁，靠口耳相傳的各經才得以記錄復出。由於傳述者不是一家，記憶有所不同，所以各經有不同的傳本。至於《樂》，它的主要構成部分是音調樂譜，不經過一定的訓練是不能辨認和傳習的，當時自然沒有這個條件，所以到漢初時，已經無人能夠傳授。

另一派則認為，原本就沒有《樂》經。如清代邵懿辰《禮經通論》說：「樂本無經也。……夫聲之鏗鏘鼓舞，不可以言傳也；可以言傳，則如制氏等琴調典譜而已。」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之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而初非別有《樂》經也。」照他們的意見，樂是沒有文字的一些樂譜，並不獨立成書，漢儒傳經重文字之章句訓詁，

未諳古樂譜，因而這些樂譜失傳。

究竟原來有沒有《樂》經，它是否獨立成書呢？考察先秦文獻，我們可以確定古有《樂》經，理由有二：一、六經之名，古有記載，它不僅見於儒家文獻如《論語》、《孟子》、《荀子》等書，也見於諸子著作如《莊子》、《呂氏春秋》、《商君書》等書，可見，它是戰國時期通行的古籍之一；二、它是儒家的一個獨立的教學科目。孔子重詩教，也重樂教，「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三者教學內容和教學目的不同，傳授時間有先有後，先學《詩》，以後次第學《書》、學《禮》、學《樂》，它不可能沒有獨立的教材而僅僅作為《詩》、《禮》的附庸。

那麼，《樂》是不是只有樂譜而沒有文字呢？這也是不可能的。理由也有二：一、作為一個獨立教學科目的教材，不可能只有樂譜而沒有說明文字和理論指導的文字；二、音樂問題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中曾引起我國第一次重要的文藝論爭，《論語》中有孔子的音樂評論和樂教理論，墨子針鋒相對地著《非樂》，老莊學派提出「大音希聲」的理論，荀子捍衛和發展儒家樂教理論而著《樂論》。在先秦流傳的《樂》經，從它產生到整個流傳過程，不能說其中絕無儒家音樂基礎理論和樂教理論的文字。漢儒認為，後來收進《禮記》中的《樂記》是《樂經》的殘文，雖無確鑿的證明，卻不失為可供參考的一說。

《樂》究竟為甚麼會失傳呢？我們認為，前面所說的第一種意見，即由於秦代的嚴禁，《樂》因不易口耳相傳而失傳，這是一個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還有西漢的歷史條件和《樂》本身的原因。孔子愛好的音樂是古樂，他讚賞《韶》樂、《武》樂，整理《雅》樂、《頌》樂。《史記·孔子世家》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當時民間興起的新樂，即「鄭聲」，孔子認為「鄭聲淫」，

《論語·陽貨》說：「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於是，這位音樂復古者進行「正樂」，他編定的音樂教材，自然對新樂採取排斥的態度。人們評論說聽古樂想睡覺，聽新樂不知倦。古樂莊重平板，而且又必須有相當規模的樂隊，還要使用古老笨重的樂器，不如新樂生動活潑感人，演奏方便，所以在戰國時期古樂已經落後過時，傳習者逐漸減少。秦代焚書是儒經流傳的一次厄運，其中《樂》流傳的困難尤大。不過，它也沒有因此完全滅絕，殘餘的片段文字和某些樂譜還是流傳下來一些，說《樂記》中有《樂經》的殘文，看來是可信的，而且一直到魏晉時代，還有人演奏部分《韶》樂。問題在於，西漢統治階級「獨尊儒術」，是為發展和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統一的封建專制國家服務的，在六經中的《詩》、《書》、《禮》、《易》、《春秋》五經，都可通過訓詁和義疏的重新解釋，發展改造為適用的上層建築，而樂譜沒有改造利用的可能與必要，無須費力收集整理，所以除了保存一部分殘文，內容和形式都已經落後過時的樂譜，就任憑它們自然淘汰了。

西漢前期立《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博士，即任命了這五種學科的專任教授，在官學傳授這五種學科，從此，《樂》就從原來的儒經中消失了。

## 東漢的七經

封建社會的發展，向統治階級提出加強思想統治的新要求。原有的五經內容，不能完全滿足思想統治的需要，在經學這個外殼內，需要而且可能增加新內容，於是，在東漢開始增加新的「經」——由五經發展為七經。

「七經」之稱，始見於《後漢書·趙典傳》注引《謝承書》：「典學孔子七經……受業者百有餘人。」究竟指哪七種典籍，說法卻不盡一致，其出入是在五經外增加的兩經，曾經有不同的主張。經過一段實驗、探索的過程，到東漢通行的七經是：《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東漢除立五經為官學外，又規定《論語》、《孝經》為學生識字後的必讀書；治五經者，可以諸經並治，也可以專治一經，但《論語》、《孝經》人人非讀不可，後來乾脆就合稱為七經。

漢代統治階級推崇五經，着重的是利用以「君權神授」、「天人合一」為中心的讖緯神學。它的思想基礎是愚民哲學，因而，需要樹立一個精神上的偶像，使這個偶像成為思想的無上權威。這個偶像，他們選中了儒家學派的祖師孔子。孔子生前並不得意，死後被儒家學派奉為「聖人」，是儒家學派尊奉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聖人的繼承者。但是，其他學派並不買這個賬，老莊學派就編造出孔子問禮於老聃的故事，有的還頗不恭敬地揶揄他。到漢代，孔子被塗上耀眼的油彩，地位被無限地拔高：他是神話中的人物，從誕生到行事都罩上神異的光圈；他是秉承天意降生救世的「超人」；他是「至聖先師」，道德明智的亙古第一人，地位獨尊；他是「素王」，天生孔子，雖然生前未登王位，卻以思想學說而行一統天下之實，所以對他的意旨必須遵從。統治階級塑造這麼一個神聖的偶像，要求人們無限崇拜、無限信仰，從這個偶像口中說出的一切封建倫理道德的準則，自然不允許違背。《論語》的內容主要是孔子語錄，是聖人教誨的直接記錄，於是成為必須學習和尊奉的聖經。

為甚麼只有 1799 字的《孝經》也定為「經」呢？封建統治階級重視「孝道」，西漢統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從惠帝起，皇帝的謚號都加上一個「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等等。所謂「孝

道」，不是單純指尊敬和照顧父母，而是從屬於封建宗法思想體系的一種嚴峻的倫理觀念。在封建宗法社會的家庭，父親是家長、家庭的統治者和絕對的權威，子女必須絕對順從家長的意志而消滅自己的個性。「順為孝」，「百善孝當先」，「孝」是最高的美德；「忤逆」則是最嚴重的惡行。「孝道」和「忠君」是一致的，在封建社會裡，人人要「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行「孝道」的人絕不會犯上作亂。「孝道」利用人們血緣關係的親密情感，披着敬老奉親的溫情脈脈的面紗，培養封建制度溫馴的順民和忠實的奴才，以利於維護封建宗法制度、皇權世襲制度和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所以，東漢的封建統治階級把《孝經》定為人人必須學習和遵從的經書，而且偽託它是孔子的作品。

## 唐代的九經

唐初儒、佛、道並用，各有各的用途；而禮、政、刑、教則是儒家的世襲領地。唐太宗李世民在這些領域推行促進儒學發展的文化政策，唐初完成並頒佈了《五經正義》，為五經製作了標準的注釋和義疏；又以五經為本，提出九經之名：《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所謂九經只是把《禮記》和《春秋》各擴充為三。

《禮》原來只是《儀禮》十七篇，其內容基本上是記錄周代一些禮儀的程序和形式，對封建統治階級建立政治統治和思想統治作用不大。從戰國到西漢，經過較長時期的收集和編寫，完成了以政治制度為基本內容的《周禮》。東漢時，又把各種說明、解釋與研究禮制的學術論文彙編成《禮記》。唐代的《五經正義》，「禮」即取《禮記》。但《禮

記》畢竟成於漢人之手，不能取代原來的《禮》經，《周禮》中的官制、政制，對於唐代禮、政、刑、教的建設也有借鑒作用，因此《儀禮》、《周禮》、《禮記》三者都作為經書傳習。

《春秋》經文過於簡約，傳注必須作較多的補充和發揮，注釋疏解有相當的活動餘地，各家傳注便有很大的不同。從漢代傳下來的《春秋》傳，影響較大的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三種。唐初的《五經正義》，選的是晉代杜預集解的《左傳》。可是，《春秋》三傳內容各有側重，記事與義理有較大出入，不宜偏廢。於是，採取立傳為經的方式，改立《春秋》一經的三傳為三經。

那麼，唐前期的九經，為甚麼不收漢代已立為經的《論語》和《孝經》呢？

《論語》基本上是孔子的語錄集，它的地位隨孔子的地位而升沉。在唐代前期，孔子的地位不如在漢代那麼高。唐太宗李世民樹立的神聖偶像是如來佛和太上老君，一方面向佛祖膜拜，一方面奉太上老君李耳為玄元皇帝和李氏的始祖。當時正處於「太平盛世」的大唐帝國，需要的是維護安定、繁榮的局面，以圖長治久安。這兩個偶像，一個教人逆來順受，修行來世；一個教人脫離現實，清靜無為。對唐王朝的統治，他們比鼓吹積極入世的孔子，是更加保險的。所以，孔子被相對地冷落了一段時間，《論語》也就不是人人必須誦讀的經書了。

《孝經》的內容是以提倡「孝道」來維護封建宗法制，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長子繼承制。李世民殺掉哥哥，又逼迫父親讓位，而後登上寶座。他是封建宗法孝悌觀念的叛逆者。李世民死後，又有武則天長期執政，還當了女皇帝，廢了太子，擾亂了父系制，更是封建宗法制的破壞者。她的政敵一直用宗法正統觀念來攻擊她，甚至利用人們頭腦中潛存的這些意識，動員封建階級內部的各種力量起兵「討伐」她，

她怎麼會提倡危及自己存在的理論呢？從李世民到武則天先後執政七十七年，他們都不提倡《孝經》。

## 開成十二石經

唐玄宗李隆基消滅了韋氏統治集團，李氏復辟，號稱中興。唐王朝經歷的危難，使封建統治階級進一步認識到「以孝治天下」對於穩定天下、鞏固政權的作用，所以《孝經》又被推崇。李隆基親自到太學宣講《孝經》，並為之作傳注，倡導人人必須學習和力行。李隆基的《孝經注》傳佈天下，後來由宋人收入《十三經注疏》，一直通行至今。

唐中期以後，佛教風靡於世。佛家的出世思想，造成整個社會精神風貌的萎靡；而佛家「無父無君」的思想，更促使封建君主專制政權的衰頹和封建倫理關係的破壞。比較起來，佛家思想對於維護封建統治已是利少而弊多，而儒家學說既是反佛的有力武器，又能夠起到振興政治、鞏固封建統治秩序的作用，弊少而利多。於是，儒學又受到重視，重被作為治國的理論基礎，孔子這位精神偶像，也又受到特別的尊崇。李隆基即位後，採取調和儒、道的辦法，一方面自稱是玄元皇帝後裔，與佛教抗衡；一方面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宣稱孔、老同世，源出於一。但儒、道相比，道家思想體系的政治內涵比較薄弱，禮、政、刑、教都尊孔子。孔子又成為思想權威，《論語》也重新成為經。

唐初編撰《五經正義》，目的是統一五經的文字、訓詁和義疏，作為國家考試和教學的標準本，以免傳習與解釋各異，無所依從。唐前期以五經為本擴充到九經。中期擴充到十一經，新增的諸經，又產生了訓詁應求統一的問題。《爾雅》本是一部古代訓詁的彙編，對古

代經典詞語較為普遍地作了解釋。既然五經的「傳」(《春秋》三傳)、「記」(《禮記)、「論」(《論語》)都已經立為經，這部讀經傳所必須翻檢的辭書，正可以作為諸經訓詁的共同依據而收統一之效，於是把它與那些成為經書的「傳」、「記」、「論」列入同等的地位。

唐後期，文宗開成二年(837年)，於長安國子監門前立石，刻十二經作為士人傳習和考試的十二學科及其文字定本，稱「開成石經」。這十二經就是唐前期的九經加上上述三經，它們的次第是：《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

### 宋十三經和四書五經

到宋代，原來的十二經再加上《孟子》，便成為流傳至今的十三經。

早在唐代，被稱為儒學一代宗師的韓愈及其弟子李翱，積極捍衛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尊崇孟子是孔子的嫡派，鼓吹繼承從堯、舜到孔、孟的道統。宋代階級鬥爭、民族鬥爭和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十分激烈，孟子的學說受到宋儒的推重，他們自稱繼承孔、孟和韓愈的「道統」，建立了後期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體系——程朱理學。

孟子學說有幾個主要的組成部分：它的仁義學說以民本思想為基礎，以重民、養民、保民為綱領，以「王道」為理想，作為開明的封建政治理論，有利於緩和階級矛盾，謀求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它提出了一套唯心主義歷史觀，包括以「君權天授」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為特徵的天命論，「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天才論，「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剝削合理論，為封建制度的「永存」提供了理論基礎。它創始的人性論(「性善論」)，以及盡心、知性和「萬物皆



備於我」的心性之學，誇大精神和意志的主觀能動作用，發展了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成為宋明理學家心、性、命、理之學的基礎。《孟子》一書提出獨立人格思想，要求人們注重道德修養，把封建道德觀念凝聚為巨大精神力量，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捨身取義」的「浩然之氣」，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的歷史責任感，持節不屈，積極有為，奮鬥不息。宋儒繼承和發揮孟子的這些理論原則，推崇孟子為地位僅次於孔子的儒家第二把手，《孟子》一書也就成為人人必須誦習的重要經典，與原來的十二經合為十三經。

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取《論語》、《孟子》，又取《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合稱「四書」，與「五經」相配，稱「四書五經」，作為士人讀書的基礎讀本。他之所以選取《大學》一篇，是繼承韓愈所提出的主張，以《大學》為政治哲學綱領，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理想。選取《中庸》一篇，是繼承李翱的主張，把它作為審理事物、處理問題的哲學方法。朱熹把這兩篇文章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並舉，並為之作章句注釋，顯然是特別推重的意思。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四書五經作為十三經的基礎部分流行。明代把經書合刊，仍是刊行宋版十三經，直傳至今。

現在影印的清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注疏本如下：《周易》——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尚書》——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詩經》——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周禮》——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禮記》——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左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公羊傳》——漢何休注，唐徐彥疏；《穀梁傳》——晉范寧注，唐楊士勳疏；《論語》——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孝經》——唐玄宗注，宋邢昺疏；《爾雅》——晉郭璞注，宋邢昺疏；《孟

子》——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從這些注疏本可以看出，它們是由《五經正義》擴充到唐代九經本，再到宋代增補最後的四部注疏本，完成現行的《十三經注疏》。最早的版本是宋光宗紹熙年間（1190—1194年）三山黃唐合刻本，現在通行本是清阮元主持校刻的善本，中華書局於1979年據原世界書局縮印本影印，影印前作了校勘。

十三經正文，去篇名計有647500多字，其中最長的是《左傳》，196000餘字；其次是《禮記》，99000餘字，二者稱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最短的是《孝經》，只有1799字。在《十三經注疏》中，所取《尚書》經清人確鑿的考證，是偽《古文尚書》，舊題孔安國傳是偽孔傳，正文和傳注都是晉人的偽作。雖然如此，這一部分也不是毫無價值，偽《古文尚書》中包括的《今文尚書》28篇是真實的《尚書》，偽孔傳和賈疏也有參考價值，所以清人校勘重刻，並不予廢棄。

現在通行的《四書五經》，不全同於《十三經注疏》所取的傳注本：《周易本義》——朱熹注；《書經集注》——蔡沈注；《詩集傳》——朱熹注；《禮記集說》——陳澧注；《春秋三傳》集三傳舊解；《大學章句集注》——朱熹注；《中庸章句集注》——朱熹注；《論語章句集注》——朱熹注；《孟子章句集注》——朱熹注。

#### 第四節 經學研究的對象和範圍

儒學和經學並非同一概念，但二者又有着極為密切的聯繫，常常很難把它們截然分開。

## 儒學和經學

儒學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指由孔子所創立，戰國時期已經成為顯學，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又不斷發展並最終成為具有完備的學術體系的一個學派。

傳說孔子弟子三千，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死後，他眾多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在社會上繼續傳習六經和孔子的思想學說，形成顯赫一時的儒家學派。在傳承過程中，儒學亦分流，所謂「儒分為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韓非子·顯學》）。按「孫氏之儒」即荀卿（荀況）一派。這八派中，聲望最著的是孟子、荀子兩派，孟子、荀子都對孔子的思想學說有所豐富和發展。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學說，後世統稱為先秦儒學，或稱原始儒學。西漢經學的諸經大多自荀子傳授下來。宋代以後，孟子被儒家奉為僅次於孔子的神聖偶像。兩千餘年的儒學，是一個動態的、包含內部矛盾的發展着的思想體系，先秦儒學則是它的基礎和內核。

西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學奉為官方正統學說，傳播這一學說的儒家典籍被定為「經」，從而興起了歷史長達兩千年的經學。

經學的基本特徵，是以封建國家所承認並頒行的五經及其他經典作為依據，通過對它們所進行的標準的解釋，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理論基礎和行為準則，從而主宰封建社會的思想文化領域。從西漢起，經學作為儒學的一種主要表現形式，曾經成為各個時代儒家不同學派的學者用以闡釋他們思想學說的學術陣地，他們結合自己時代的要求，通過對諸經的闡釋，提出治世的方策。

從本質上說，經學是為封建主義及其專制制度服務的上層建築。但是，事物內部又包含着自己的對立因素，這種對立的因素在先秦儒學內部即已經明顯地存在。

當激烈的社會鬥爭推動社會改革，當由於內部的或外部的原因使封建的政治統治和思想統治面臨危機，某些進步的思想家曾經與專制主義相對，不同程度地宣傳了民主思想和民本思想；與唯心主義和讖緯神學相對，不同程度地宣傳了唯物主義的進化論和無神論。這種情況在後期封建社會內憂外患、民族瀕臨危亡之時，為了救亡圖存，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些思想家，或注經，或釋經，越出了封建王朝固定的樊籬。例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曾治經，他們都是通過注經釋經的形式，呼籲社會改革和抨擊專制。顧、王的書有些已被收入《清經解》正續編，其中包括顧氏的力作《日知錄》，也被當作經學著述。其實，其體例和內容與一般經學著述並不相同，在儒學中也是少見的進步著作。像這樣的書，我們很難把儒學和經學分辨開來。歷史上許多儒學學派都和經學有着密切關係，而許多經學學派也就是儒學學派。

儒學起始於春秋末期的孔子，直到今日，仍有所謂「現代新儒學」；經學則起始於西漢時代。到清末，由於封建社會的衰亡，封建國家不復存在，已經喪失了由國家頒行這些儒家經典作為理論依據和行為準則的社會條件，因而封建主義的經學也隨之衰亡。現代雖然仍有對儒家這些經書的研究，則是在新基礎上以新的目的進行的傳統文化的研究，與過去的經學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經學這一門學術，迄今已有兩千餘年的歷史，在漫長的發展中，它的內容有訓詁之學、義理之學和考據之學，下面分述之。

## 訓詁之學

《易》、《書》、《詩》、《禮》、《春秋》五經都是先秦舊籍，文字簡約。從戰國到西漢，語言文字經歷了幾次重大變化，到漢代已經很少有人能夠讀懂。從字體來說，先秦先是大篆（籀文），後是小篆，漢是隸書（魏晉後又盛行楷書）。從語音來說，許多字的讀音有了變化。從詞彙來說，一部分詞彙隨着社會生活的進程而衰亡，更多的新詞產生，有的詞義也發生了變化；而且先秦典籍中普遍出現假借字，這有時是書寫的原因，有時則是由於當時文字詞語不足。大量假借字造成領會經義的困難，字句不通，文義難明。為了對這些經書的字句文義作解釋，產生了諸經的「傳」、「注」、「箋」、「疏」、「集解」、「正義」、「章句」等等不同體例的著述。

「傳」、「注」、「箋」、「疏」、「集解」、「正義」、「章句」等，名稱不同，都是注釋的意思，但不同的使用情況，各有特定的含義。

「傳」：是傳述的意思，即解釋經文，闡明經義。它有三種基本形式，一種是依隨經文逐字逐句解釋，如毛亨《毛詩故訓傳》；二是闡明經典中的所謂「微言大義」（簡約精微的語言含蘊深奧的道理），如《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三是對經典中的紀事進行補充和描述，如《春秋左氏傳》。

「注」：是對經文中難解的字、句加以解釋、疏通，如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注》，漢鄭玄《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漢趙岐《孟子注》。

「箋」：是引申、發揮或補充、訂正前人的傳注，如鄭玄以《毛詩故訓傳》為本，一方面對其簡略、隱約之處加以補充和闡明，一方面又把不同的解釋提出來，而不與《毛傳》相雜，稱為「鄭箋」。

「疏」：是魏晉以後出現的「義疏體」，它的特點是依據一家之說，對經文逐字逐句逐章申講，好像講義式的講疏，如皇侃的《論語義疏》。到了唐代，不但先秦文獻深奧難懂，連漢人傳注也不易明了，不但需要解釋正文，還需要給前人的傳注再作注解，如賈公彥疏鄭玄注三《禮》，徐彥疏何休注《春秋公羊傳》。

「正義」：唐初「經學多門，章句繁雜」，各家傳注歧義紛繁，教學與考試都無依傍，於是貞觀年間孔穎達等奉敕全面整理五經義疏，名為「正義」。「正義」的方法是每經只採一家注解為主，撰述義疏採取「疏不破注」的原則，不雜他家之說，作為標準本，名《五經正義》。

「集解」：這種體例興起於魏晉，特點是薈萃眾說，不主一家之言，把諸家可取的解釋連其姓名一一列出，對不妥的解釋加以指正，意在取諸家之長而自成一書，如魏何晏《論語集解》、范寧《穀梁集解》。

「章句」：這種體例，除了釋詞，還重在解釋句、段、篇、章大意，如漢趙岐《孟子章句》，除注詞釋句外，每章之後都有「章指」，即通釋全章正文的大意。

上述幾種體例，有時很難截然區別，總的都可稱為「訓詁」。「訓詁」一詞，就源於《毛詩故訓傳》，「故」通「詁」，《毛詩正義·周南·關雎疏》解釋「詁」、「訓」二字的涵義：「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簡單地說，「詁」就是用今語釋古語，用通行語釋方言；「訓」就是對文獻語言的具體含義作形象的描述或說明，不僅釋詞，而且疏通文義，並解釋語法、修辭和句、段、篇、章。後來，「詁訓說成了訓詁」，而且不再分開，成為語義學的專有名詞，又形成整理研究古籍的一種專門學問。

對經書的「訓詁」越來越要求確切有據，因而，必須對字形、字音、字義進行深入的科學的研究，於是發展了文字、音韻、訓詁之學，

俗稱「小學」。經宋、明到清代乾嘉學派，產生了大量著述，達到興盛的頂峰。當然，「小學」著作不全屬經學，但它開始是從注經產生並發展起來的，在經學著述中歷來列有「小學」一類。《四庫全書總目》收清初以前的經部著述，其中「小學」類 218 部，2122 卷。

這些訓詁著述具有一定的價值：首先，使我們能夠讀懂古籍，如果沒有歷代的訓詁，這些古老的文獻只不過是一串串難於辨義的文字符號；其次，為我國語言學、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所以，它們是我國文化遺產中的寶貴財富。

### 義理之學

五經是上古典籍，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不同時期，為了使經學積極地為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地主階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按照自己的政治觀點和哲學觀點，通過分析和陳述五經的內容，發揮自己的思想見解。五經文字簡約，有補充和發揮的較大的餘地，於是就有了所謂的「義理之學」。

義理之學有兩種形式：一是在傳、注、義疏之中，通過注釋或串講，隨文依義地進行發揮和闡述；一是並不依隨經文，而是根據自己的思想見解撰寫論文，或闡明自己的心得，或評述諸經內容，或專題提出某種哲學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主張。這些論文大都採用「義」、「記」、「論」、「說」等名目。

「義」：就是闡明經文中某一部分的意義。如收進《禮記》中的《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等文章，就分別說明《儀禮》中的《冠禮》、《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各篇的意義。在《儀禮》中，這些篇章記載了舉行這些禮儀的具體儀式和過程，